

附 79

個人道德 與社會改造

青年協會書局出版

楊續譯

種四十二第書叢年青

造改會社與德道人個

所

版

種四十二第書叢年青

造改會社與德道人個

有

權

民國二十四年八月初版

原著者

Reinhold Niebuhr

譯述者

楊 續

校閱者

青年協會書局

發行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

每冊實價大洋六角（寄費另加）

YOUTH LIBRARY NO. 24

MORAL MAN AND IMMORAL SOCIETY

By Reinhold Niebuhr

ASSOCIATION PRESS OF CHINA

Price: 60 Cents, Postage Extra

1st Ed., August, 1935

青年叢書

本書爲青年叢書之一種。叢書共分四類：（一）青年與性生活；（二）青年與修養；（三）青年與社會改造；（四）青年與宗教。每類暫定十二種，共四十八種，預定於民國二十三至二十五年之三年內出完。欲知叢書內容及其出版日期，或有意訂購者，請向上海博物院路一三一號青年協會書局函詢。

目錄

緒言	一
第一章 人與社會——共同生活的藝術	一三
第二章 個人對付社會生活的理性資源	三〇
第三章 個人對付社會生活的宗教資源	五一
第四章 國家的道德	七八
第五章 特權階級的倫理態度	一〇三
第六章 無產階級的倫理態度	一二七
第七章 從革命而來的公理	一四八
第八章 從政治勢力而來的公理	一七三
第九章 政治中道德價值之保存	一九八
第十章 個人與社會道德的衝突	二一八

緒言

個人之道德的和社會的行爲，與社會的集體（如國家的，種族的，經濟的集體）之間，確有着作明晰的區別之必要；這種區別，使政治方略成爲應有和必需的，可是純粹個人主義的倫理，却時常與之格格難合。本書所以原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這書名來暗示這種區別，本來是太不恰當的，不過無論如何，它總可以清清楚楚地指示出本書的論點來。個人們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道德的，他們在決定行爲的問題時，能够爲別人的利益着想，有時且能把別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他們天生成就有些對同類的同情心，並且願意爲他們設想，這種本質是可以聰明遠見的社會教育去發展的。他們有理解的才力，因之他們也有對於正義的感覺，只要有了教育的訓練，就不難陶鍊和湔盡那些自我主義的質素，使他們在觀察一種利害當前的社會形勢的時候，能够運用很多的客觀性。可是這一切成就，要在人類社會的集團中實現，雖不是絕對無可能性的，也是比較的困難的。在每個人類的集體中，那種克制和引導感情的理智，比較的缺乏，那種自我超拔的能力，比較的不多，了解別人的需要的能力，也比較的少些，因之一種比構成團體的個人們更放縱一些的自我主義，就在人和人的關係之間表現出來了。

集體的道德比個人的道德更薄弱，原因可以分兩方面來說：一方面，要建立一種理智的社會勢力，使它

充分的強有力，可以抵抗那種結合社會的自然衝動，就非常的困難。在另一方面則有集體的自我主義之顯露，與個人的自我衝動相結合，於是而成爲一種共同的衝動，這時候，比較他們分別的表現要來得更活潑，而且更有團結的效果。

本書要和宗教的以及人事的道德家作辯論，因爲這些人以爲理性的發展，以及被宗教激發出來的好心，很能阻擋個人的自我主義；他們更以爲，要在人類的社會團體間建立一種社會的協調，便只有繼續這種發展的過程。根據這種假設，道德家、社會學家，以及教育家等就作出社會的分析和預言來，並造成了今日道德上和政治上的種種混亂狀態。他們不知道在人類的集體行爲裏面，有些屬於自然的成分，是永遠不能完全全拿來攔在理智和良心的勢力範圍以內的，因此，爲了人類社會的公理，政治鬥爭本來是必要的，而他們却完全置之不理。他們不知道，一種集體勢力，不管它採取的是帝國主義的形式，還是階級統治的形式，其對於弱小者的擄取除了用權力去抵抗以外，是不會取消的。假如說，理智和良心可以灌輸到鬥爭中去的話，它們也只能節制，而不能把它完全取消。

近世教育家和道德家假如說，物理科學創造了人類的技術文明，而社會科學則瞠乎其後，這是社會問題所以發生的原因，這話便是他們最固執的錯誤了。這種假設，無疑地含了這樣的意思：只要時間長久一些，道德的和社會的教育充分一些，同時人類的智慧能普遍地發展到較高的程度時，我們的社會問題就可以得到解決了。杜威教授說：『我們人類的智慧和勇氣是在受着試驗了，說也不相信，人們使物理發明和應用』

的技術達到這樣完全的地步，竟會在無窮重要的人類問題上束手讓步。目前對於有計劃的經濟之最大阻礙，只是些陳腐的傳統勢力，被蟲蛀了的標語和口號，這些東西是以思想和掠奪的自私來代替本分的。只要我們停止了空口的廢話，就能開始智慧的思想……只要我們能應用現有的智慧和技能來控制社會的影響，以求得一種共享的，豐富而安穩的生活，那我們就不會抱怨社會智識的落伍了……那時我們就能踏上建設社會科學的大道，即如人們活潑地在物理實驗裏面應用技術，工具和數目，來建設物理科學一樣。」（註二）雖然杜威教授對於近世社會問題很有興趣，也能夠了解它，可是他這段話，實在一點也不清楚。社會惰性的真正原因——『我們之掠奪的自私性，』在這裏只是提了一提，對於他的理解並不發生影響，也並沒有指出他對於社會的保守主義之由於有產階級的經濟利益這件事，究竟懂得了有多少。總而言之，把社會保守主義都歸咎於無知，這種見解只有一半是真的，並且表示出教育家的自然的偏見。所謂只要我們『停止了空口廢話，』就能開始有智慧的思想這句話，其本身已是那樣的淡而無味，只能洩漏出分析家的混亂，對於社會的惰性，並沒有清楚的解決方法。他忽略了物理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的重要區別，便說，要是不能像物理科學家那樣地拿社會問題來作實驗，那我們就不能算為社會生活中的智慧者。物理科學打倒了基於無智的傳統主義，獲取了它的自由，可是社會科學所覲面的傳統主義，都根源於社會上諸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這些階級正在死亡的維持他們在社會上的特殊權利。況且社會科學和物質科學在本質上的不同，也是不容忽視的。在社會情形上，完全理性的客觀，根本就不可能。有些社會科學家，急於要向我们提出他們的救

世良方，苦於人們的無智和怠惰，不能很快的領受他們的智慧。但他們所寫的東西，不管寫的是什麼，都洩漏出他們那種中產階級的偏見。因為理智到某程度為止，總是社會地位的忠僕，所以社會的不義，不能像教育家和社會科學家通常所相信的一樣，僅僅由道德的理性的說服，就能解決得了的。衝突天然不可避免，在衝突的場合中，權力只可用權力來對付。這種事實，很多的教育家還是莫明其妙，可是許多的社會科學家却不得不咕嚕着嘴地來承認。

杜威教授的許多門生時常說，如果要解救人類，只有在社會生活裏發展『實驗的過程』和物理科學的實驗主義一樣，其實，假如社會的矛盾在獲取社會正義的過程中佔一位置，那麼他們這種說法真是過甚其辭了。社會鬭爭中的各鬭爭成分必須有一種鎮定力，這一種力，只有從正確的主義、教條，以及充滿情感的簡單化裏面產生出來。這些東西，至少和科學精神的試驗有同樣的重要。假如產業工人完全採取近代教育家的『實驗技術』，（註二）他們就不必想從統治階級中取得自己的自由。假如他們非有充分的力量來和強者爭鬭不可，那麼他們就不能不堅決相信自己的主張是合乎公理，同時也得相信它有勝利的可能，但如果要按那不偏不倚的科學來說，那他們就不能那樣地相信了。在計劃他們的社會目標時，在選擇有效的工具，以謀達到這個目標時，他們儘管是非常的科學化，但是那種策動他們前進的動力，却不是科學那種冰冷

（註一） 約翰杜威著「哲學與文明」三一九頁。

（註二） John Childs 著「教育與實驗主義的哲學」三七頁。

的客觀性所易產生的。像一切的理性家一樣，近代的教育家都迷戀於生活中理性的作用。可是歷史，特別是人類的集體行為，却永遠不受理智的支配，除非理智自有工具，除非它的本身受一種非理性的力的鞭策。

社會學家比教育家更不懂得近代的社會問題。他們時常以爲『行為的格式』有各種各樣，而且是互相衝突的，因此就產生了社會的矛盾現象；其實在鬭爭中的各方面，如果能讓社會科學家來替他們找出新的完善的格式，以求適合雙方的需要，那麼，這種矛盾就會消滅了。至於教育家們，則以爲無智乃是矛盾的原因，自私還說不上。吉姆包楊格（Kimball Young）說：『顯然的，使行為轉向一個比較更可能的，合乎環境的目的，那麼一切集體的個人的矛盾就可以順利而健全的解決，這是唯一的辦法。要使這一辦法宣告成功，最好是提高神經心理和智識符號的水平，在這樣的水平面上，採用自由討論，帶一點宣傳的作用，把人們的態度合理地改變過來，使能適合科學的事實。要求得心智的和社會的健康，這却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但是從外表上看來，它似乎是達到那目的的唯一方法。』（註三）在個人的關係上，在因文化不同而發生的某幾種社會衝突中可以適用的技術，在這裏竟被看作一服萬應仙丹了。試問英印的衝突怎樣才能解決？難道是用圓桌會議麼？假使衝突的一種——不合作運動——沒有逼上頭來，那麼英國在那次會議中能給印度以多少利益？

社會科學家總喜歡勸人調和。兩方面在衝突的時候，就請他們會商一下，彼此讓讓步，達到和解的程度，就完事。赫德教授（Professor Hornell Hart）（註四）就是這樣主張，許多別的人也和他一樣。自然，有許多

衝突是應當這樣解決的，可是一個被打倒的集團——即如黑種人——就能用這種方法去得到公理麼？即使他們提出最低限度的要求來，那些霸道的白種人能夠不說他們是妄想非分麼？那些白種人就少有幾個能從客觀的公理來注意種族間的問題。再者，有產者的勢力比無產階級大上許多，不管他們怎樣說不出道理，他們總可以用爭辯來得勝利，試問工人們將怎樣按照赫德教授的話，去和雇主辦交涉呢？社會科學家中間，簡直沒有幾個人知道由權力不伴所發生的衝突，也沒有幾個人知道，在權力始終不相伴的時候，是沒有公平解決的希望。有些社會科學家，如亞爾波得（Floyd Allport）簡直不懂工業文明的真正事實，但是他們却說，工業勞動者的不安，不是由於經濟的不公平，而是由於一種卑賤的感覺，所以，只要有慈厚的社會心理學家能去教訓工人說：『沒有誰看他們是卑賤的，只有他們自己，』（註五）這種感覺就會自然而然地消滅了。這些萬能的社會科學家也要教訓一般雇主，叫他們要『一方面取得利息和利潤，另一方面要為工人着想。』這樣，『工業中個人管理的社會化，』就可以消弭『社會的管理。』大部分的社會科學家，是不夠資格的理論家，他們似乎想像，只要有社會科學家能評量有權力者的行動和態度是反社會的，他們就會立刻減少他們在社會裏的需要和要求。克斯教授（Prof. Clarence Marsh Case）在分析社會問題時，對於

（註三） Kimball Young 著「社會態度」七二頁。

（註四） Hornell Hart 著「社會關係的科學」

（註五） Floyd Allport 著「社會心理學」一四——一七頁。

『價值改組』說很有信仰，他說：『在一個拿德謨克拉西當信條的社會裏，專斷地操縱工業是一件不合時宜的事，且是不會長久的。』（註六）在價值的改組中，除了許多別的事以外，還得使工業領袖們曉得這一層專制是不會長久的，可是它的倒台，絕不會是因為專制者發現了它的過時的緣故。掃特爾爵士（Sir Arthur Salter）是社會科學家家中一位聰明的經濟學家，他對於現代文明的顛倒，曾作了一種透闢的分析，結尾他也照例的希望將來的政府，能以較高的智慧和真誠的道德，來避免重犯過去的錯誤。他自己的分析，道地的證明政府之所以失敗，並不是『人類的智慧能力有限』，實在是因為經濟利益的壓力太重所致。他自己曾這樣說：『政府之所以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給與競爭的工業以無限制的——特別是優先的——權利，這一種任務竟把它纏住了。』（註七）雖然如此，掃特爾爵士仍期望政府採用『集合各種組織，為公共服務』的一種方法來拯救文明，並將代表國內各種有組織的活動之私人團體，商會，銀行機關，工業界和勞動界的組織都集合起來，以從事於這種公共服務。他的全部恢復的希望，就是想在有權力的人中間發展一種對於經濟的淡漠心理，但人類的歷史却證明這是不能獲得的。一般以研究人類集體行為為職志的人，竟會這樣不費心的相信集體人在道德上的可能性，真令人灰心。即使他們（如霍華俄得姆 Prof. Howard Odum 教授）有意承認『只要勞力所得的報酬分配不均，……衝突就沒法避免』，但他們還是把他們的希望放在將來。他們以為社會衝突只是一種便利的方法的暫時適用，『等到教育與合作的擴大原理能够建立起來為止。』（註八）似乎無政府主義以其自動的，毫無拘束的公理，成了每個蹩腳的社會科學家之顯明的或

暗示的社會目標。

近代宗教理想家跟在社會科學家的背後，也宣傳妥協與和解，以之爲獲取社會公理的方法。很多的教會領袖固執着說，他們用不着替工人和資本家說話，他們只須勸告雙方要有一種公平的與和協的精神。尼格森博士（Dr. Justin Wroe Nixon）說：『在楊歐文的遠見的資本主義和麥克唐納爾之頑強的社會主義中間，恐怕是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鴻溝的。人類的進化……就在於追隨麥克唐納爾和楊歐文之流的人，以達到那些境地。』（註九）可惜自從他寫了這幾句話以後，麥克唐納爾的社會主義已明白地顯出並不是什麼特別頑強的，同時經濟界的不景氣已經指出，在楊歐文的『新資本主義』和舊式蠻橫的資本主義之間，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這些宗教的以及理性的道德家，不懂得人類集體的行爲是殘酷的，也不知集體間的關係裏面所有的自私，和集體的自我主義是怎樣利害。集體自我主義不能容納道德的和社會的目的，這一點他們不能認識，所以他們不得不被一些非實際的混亂的政治思想所蒙蔽。他們要是不說社會衝突決不能達到道德的目

（註六） Clarence Marsh Case 著「社會過程與人類進化」二二三頁。

（註七） Sir Arthur Salter 著「恢復」二四一頁。

（註八） Howard W. Odum 著「人類尋求社會的指導」四七七頁。

（註九） Justin Wroe Nixon 著「在湧現中的基督教信仰」二九四頁。

的，便說它是一種暫時的方法，只要有了完美的教育和純潔的宗教，它就用不着了。人類的想像是有限制的，理智往往被偏見和情熱所屈服，因此，非理性的自我主義的持久性，特別是在團體行為那一方面，使社會衝突在人類歷史上成爲不可避免的事，也許到它的末日都是如此，這一些，他們全看不到。

在我們的中等階級的文化中，流行着一種對於人類德行和道德的能力之過分而浪漫的估計，它對於目前的社會事實，並不是時常不真實的。現代的社會情形，也時常被人們作很真實的估計，但也有人希望，在將來能有新的教育和復興的宗教，使衝突變成一種不必要的東西。不過也有很大一部分的中等階級文化，對於現代的形勢，分析得很不合實際。他們假定說，在目前階級間和國家間，已有一種正在生長的兄弟之誼，可由事實來證明。這兄弟之誼已促成了國聯的產生，凱洛格公約的簽訂，以及公司企業的組織，這種道德上的和社會上的成就，往往被一般的事實所蒙蔽。斯特拉冬教授（Prof. George Shatton）是一位社會心理學家，他說：『連續而擴大的進步必然是常有的。可是在今日，我們的時代似乎在告訴我們，在世界的關係中，舊的時代將告結束，代之而起的乃是一個新的時代……受了戰爭的莊嚴教訓，大部分的國家都立了政治的心願，要自行檢束，這對於國際的訓練和更多有效的政府法規的實現，不啻是一種預示的信號。（註十）尊視國聯爲國際關係之新時代的象徵，這種說法，在基督教會中是非常普遍的，但時常是很不適當的，因爲自由的基督教常想使社會關係漸漸地受『基督的法則』的支配。布朗先生（Brown）是站在整個自由基督教的觀點說話，他說：『促成統一的，像兄弟關係般的社會之運動，已在各地方和各種形式之下進行了。

國聯的理想，是要使國聯能代表一切文明的人類，使他們能在那兒合作，與人類公敵如戰爭和疾病作鬭爭。這種理想，已被許多團體所認識，而這些團體之講究理想，已少有人會懷疑的。……在種族關係之間，在勞資鬭爭之間，以及是我們對社會上弱分子的態度上，我們已經發展了一種社會良心，同時二十年前視為固然的情形，在現在看起來，就成了一種容受不了的醜事。」（註十）還有一個神學家兼牧師的尼格森先生，他以爲『商業領袖中有一種社會性的政治家才能正在發展，因爲他相信商業領袖在慈善事業和教育事業中有作董事的經驗。』（註十二）這種判斷，把自由基督教在道德上的混亂情形清清楚楚地表現出來。社會制度裏面的慈善問題，與近代經濟團體間爭公理的問題，原有不同，那些講道德的先生們看不見這一點，因爲他們沒看見集體道德與個人道德間那些最明顯的分別。如果把抵抗疾病和反對戰爭看作一類，結果也將產生同樣的混亂。我們的近代文化真不了解人類關係中集體自我主義的力量，範圍和持久性。要在集體中的個人之間完全採用道德的，理性的勸告與調協，以取得公平的關係，雖不能算是容易的事，但也有可能性。在集體的關係之間如果要這樣，那簡直是毫無可能性的。所以集體間的關係，必然是政治的佔主要地位，而倫理的只居其次；換句話說，它們中間的關係，是由各團體間所有能力的比例來決定的，而對於各方的要求

（註十） George M. Stratton 著「社會心理與國際行爲」三五五——三六一頁。

（註十一） William Adams Brown 著「到真實之路」二四六頁。

（註十二） Justin Wroe Nixon 著「在湧現中的基督教信仰」二九一頁。

加以道德的和理性的估價之決定作用，最多也不能超過前者。在政治關係中的強迫成分，有別於比較純道德的理性的成分，那是永遠不能加以明細的區別和界說的。我們不能把社會衝突中某一方面究竟是受合理辯論的影響，抑或是屈服在威力之下，作個估計。比如特權階級之接受遺產稅，究竟因為他相信這種稅律是好的社會政策呢？抑或是國家威力支持着這種課稅政策，使它不得不屈服？這兩者之間的比例，我們是無法知道的，因為使政治衝突進行的，是強力的威脅，而不是它的實用，至少在矛盾還未達到危機迫切的關頭時是這樣，因此那些浮動而淺薄的觀察者，便很容易過分地去估計道德的和理性的成分，同時對於衝突中強迫暴力的隱秘形態，則茫然無所知覺。

在人類的歷史中，無論社會的智識與精神上的善意增加到什麼地步；無論這種增加能怎樣調解社會衝突中的殘暴性，但它終不能消滅衝突的本身。要消滅衝突的本身，必須假定人類的集體——種族的也好，民族的也好，經濟的也好，——能得到某種程度的理智和同情，使他們能够鮮明地看出和了解別人的利益，如同他們知道自己的一樣，同時也要有一種精神上的善意，使他們能够竭力地承認別人的權力，像承認自己的一樣。設使人性免不了的受着限制，而人類的想像和智識又都有限，那麼這種理想雖在個人可以達到，但決不是集體的能力所能及的。注重人性的柔韌之教育家，夢想着人的『社會化』的社會心理科學家，以及努力想增加道德責任心的宗教理想家，在社會裏面都能有很大的作用，可以在既成的社會制度裏面努力使個人『人情化』，同時把個人關係中之自我主義盡量的消滌乾淨。但是在必需有激烈的社會變革的

問題方面，他們的主張差不多都是混亂不清的，因為他們不知道人性的限度，這件事終究妨礙了他們的努力。

本書的任務，在於分析道德的源泉和人類本性的限度；在於探究他們的結果，以及在人類集體生活中的集合作用；更在於以確定的事實，去衡量政治的策略。這種任務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找得一種政治的方案，使人們在達到社會的倫理和社會的目的時富有把握。這種方案的判斷，以兩個標準為定：(1)它們是否適合人性的道德源泉和可能性，是否能盡量開發人類隱伏着的道德能力？(2)它們是否能顧及人性的缺點，特別是集體行為方面所表現出來的中等階級裏面在政治上有些頑固的幻想，因此對於第二點之注重在一般讀者們的印象中，也許以為是用不着的憤世之談。社會觀點和分析，和產生它的時代的氣分往往相應。至美國現代的文化，至今還是被理智時代的幻想和情調纏得緊緊的。那麼根據一個幻滅了的時代的眼光，最少一部分是根據所寫出來的社會分析，但是在那些用十九世紀眼光來看事的人的心目中，就差不多是純粹的憤嫉的論調了。